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

钱端升文集

主编 张小劲 谈火生
执行主编 刘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

钱端升文集

主编 张小劲 谈火生
执行主编 刘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端升文集/张小劲，谈火生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
ISBN 978-7-302-52266-9

I. ①钱… II. ①张…②谈… III. ①政治制度—中国—文集 IV. ①D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845号

责任编辑：王巧珍
封面设计：贺维彤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5mm×260mm 印 张：22.75

字 数：401千字

版 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08.00元

产品编号：074813-01

“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编委会

主 编：张小劲 谈火生

执行主编：刘 猛

编委会成员

张小劲 景跃进 任剑涛 应 星

谈火生 刘 瑜 苏毓淞 于晓虹

孟天广 刘 猛 曲 甜 赵 娟

总 序

对那些既向往政治昌明，又钟情学术探究的个人来说，两全其美的选择莫过于修业、治学以及授教政治学。学无止境，知也无涯，穷毕生之力亦可自明通达；种学织文，诲人不倦，乐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知世则哲，学优则仕，当可奉献智识于国家与社会。

历史无疑厚待了这些自知且欲的知世者。一百多年前，一场革命的爆发、一个朝代的终结与一所现代大学的诞生交错在一起，为这个已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度带来了新思想的激荡和新学术的萌生。传统的政治智慧与治国术理，西洋的政治思维与制度创设，时下的政治运作与治理实践，汇集成了一个名曰“政治科学”的现代学科，成为可传授的知识、可研究的学问和可求解的主题。

在这所最初被叫作“清华学堂”的现代大学里，“政治学”成为最早开设的课目，“政治学会”成为最早组建的校园社团，“政治学系”更是学堂改制为大学时首批开办的学系之一。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从清华园启程远涉重洋、留学海外的青年才俊，以政治学为志向者不在少数。成立未久的政治学系不仅接纳了诸多学成归国的政治学人，而且吸引了清华园里最多数量的学生。借由这些师生的发奋蹈厉，清华政治学系迅速崛起为首屈一指的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重镇。其先生师长，建树丰厚，享有学界显赫声名；其后进学生，撒播八方，讲学从政致用其长。

清华政治学系因1952年院系调整而取消，历经五十余年之后得以复建，再十年后又有重组。由是之故，政治学在清华，一如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道崩裂的场景似多于弦歌不辍的情形，原本辉煌的片段久蒙积年累月的尘埃。然而，历史毕竟仍是慷慨大度的。当我们这一代政治学人再度聚集清华园时，系史的原始档案以及前辈学人的行藏著述无疑成了政治学系师生共同必修的功课。历史既展现了西方政治

学引入中国并渗透本土知识的融会进程，又记述了仁人志士企盼民富国强且为之付出心血的前尘往事。不欺名于先人，不湮没于事功，历史记载着事实与真相。追念前辈，追比先贤，更是历史所宣明的道理和主张。

在完成这门功课的过程中，寻觅的艰辛与发现的快乐，对于名师高徒的羡慕与恨不同行的慨叹，关乎学问的体悟与期许未来的责任感，始终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更加确信，在推进政治昌明、追寻良治善政的路途中，政治学必是能够取之汲之、惠我惠众的知识源泉。

本套丛书即是这门功课的初步作业，丛书收录数位学者的学术经典之作。这些学者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素有一代宗师的美誉。他们的学术经历和教学生涯，他们的治学态度和学业理路，他们的创新成就和知识贡献，构成了现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体内涵和无形财富，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和学术道统中最宝贵的组成部分。而他们的学术文字更是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宝库。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无疑可以更清晰地揭示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学术共同点。这些学者身上的共同点，既涉及家国命运和时代特点，又包括个人遭遇和生命历程。

首先，他们有着同样极其特殊的教育经历和学术背景，而这种教育经历和学术背景也是这一代政治学者所独有的。他们大都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精深的理解；少年时代进入现代大学接受教育；其后远涉重洋，前往欧洲或美国，再接受高度系统化的科学训练。在他们身上，中国文化的底蕴与西方学术的造诣并存而相长。

其次，他们同样处在近代中国一个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从 1920 年代中后期至 1930 年代中后期。在这段时期里，国家形式统一，局势相对稳定，但平静背后暗藏的困难和挑战，给予这代学人时不我待、时不再来的急迫感，迫使他们珍惜时间、用功学术。

再次，他们胸怀共同的学术抱负，在治学中强调引入现代政治学专业知识和先进文明的政治智慧，整理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复杂的现实素材，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方式与世界先文明对话交流，进而面对中国的问题探寻出路和办法。这种学术抱负既潜藏于中华民族传统文人积淀和传承的伦理之中，又前所未有地融入了现代学术的思维要素和科学态度。更具体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为大多数人求福祉”是他们走上政治学研究道路的理性依据和情感依托，随着专业知识的积累，他们的学

术期待演化为以学术强国、以教育救亡的现实选择，意图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救国家于即倒、拯万民于水火。环境容许，他们着力于学术；一旦有所需求，他们甘愿放弃学术而以自身所长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总之，书生报国，对他们而言不是两可之间选择，而是生存样式本身。

一如吕文浩所言：“从人事的网络来说，早期养成清华习气的那批毕业生陆续返校执教，形成以后实际左右校政方向的所谓‘少壮派’。这批人以及有意无意援引的教授大抵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工作和生活在同一个清华园内，自然容易形成相似的学风，也就是学界所称道的‘清华学派’。”尽管他们钻研的问题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相互尊重，最终都在清华共同推进着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古老中国创立现代政治学的伟大事业，是以中国素材所提炼的政治智慧培养中国的人才，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认知中国的尝试；清华政治学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使中国接近和融入世界先进文化，接触和汲取世界先进文明的功业。

从学术史的视角，老清华的政治学系表征了民国时期政治学的学术水准，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学上的典范。鉴于前辈学者学术成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特整理出版“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为往圣继绝学，为学术传薪火，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现代政治学经典”编委会

导 言

钱端升：中国现代政治学体系的拓造者

钱端升，字寿朋，1900年2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县一户世代行医的家庭。1917年夏，时年17岁的钱端升考入清华留美预备部，作为插班生入读高等科三年级。从1917年到1919年，钱端升在清华学校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1]1919年，刚满19岁的钱端升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因此而被捕。“五四”运动之后，钱端升完成了毕业手续并顺利地获得官费赴美留学。来到北美大陆之后，钱端升选择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1924年夏，时年24岁的钱端升以题为《议会委员会：一项比较政府的研究》的论文获得哈佛博士学位。^[2]

1924年9月，钱端升回到清华担任政治学课程教员。第二年5月，清华成立大学部，开始招收新生，钱端升因此担任政治学教授，他不仅是清华政治学发展的始创者之一，而且在政治学系中承担诸多政治学课程；同时，钱端升又被聘为历史系兼职教员，在历史系以英语主讲“西洋百年史”。1927年春夏之交，段祺瑞政府垮台，这年秋天，钱端升为避免军阀政府的迫害，离开了清华大学而南下。来到南京之后，钱端升先任教于中央大学，被聘为政治系副教授；^[3]同时，钱端升又兼任了大学院文化事业处处长，对清华成功改制为国立大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10月，受中央大学国民党派系之间的争端以及学生罢课的影响，钱端升被迫辞去教职。在辞职后，他并未立即返回清华，而是利用这段离职，潜心翻译了屈勒味林（C.M.Trevelyan）的名著《英国史》，后来作为大学丛书之一于193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1][2][3]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钱端升文集

1930年9月,重整身心的钱端升又回到了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这时的清华政治学进入了黄金发展期。钱端升主要开设“宪法”“英国宪法史”“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1]后来的许多学术名家如吴晗、楼邦彦、曾炳钧、王铁崖、龚祥瑞等等均在此时受教于他。在讲授宪法时,钱端升则以王世杰的《比较宪法》为主要教科书,而到1936年他们两人共同在南京任职时,又一起重新修订《比较宪法》并以两人的名义共同署名出版。作为清华最早的比较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不仅关注比较宪法问题,更有对欧美日俄诸国政府之运作加以全面描述和分析的研究计划;清华任教期间,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终于让其能够顺利完成《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两本专著。

然而,宁静的读书著述生活并未持续多久。随着日本侵华的野心膨胀和行为日彰,钱端升出于爱国之情和清华同学之谊,暂告假于清华,赴天津接替罗隆基出任《益世报》主编。自1934年1月至9月,共撰写政论170篇,揭露日军的侵华行径,批判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内幕交易。但钱端升本人终于还是因为写作《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一文,而不得不于1934年9月离开报社。^[2]此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盛邀钱端升再去中央大学法学院任职,于是钱端升辞去了清华教职而再次来到南京;但中央大学依旧是派系林立,钱端升除偶尔不得不代理法学院院长职务外,只能倾全力于政治系附设的行政研究室工作。在钱端升的组织下,行政研究室的同仁在一年内完成两卷本的《民国政制史》。^[3]

1937年夏天,37岁的钱端升终于决定离开中央大学而转往北京大学;但刚到北京未久便遭逢“七七事变”爆发。同年9月,已有北京大学教授名义的钱端升与张忠绂、胡适一起,受国民政府的委托,以参加太平洋会议的名义,出访欧美以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4]完成此项任务后,钱端升来到昆明,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8年任教生涯。抗战时期,钱端升在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则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二年级的必修课“近代政治制度”自1940年以后一直由钱端升主讲;三年级的必修课“中国政府”从1939年起即由他讲授,其间也曾与王赣愚合开此课;钱端

[1] 王铁崖:《宪法与国际法——为纪念钱端升100年冥诞而作》,见赵宝煦等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钱大都口述:《我的父亲钱端升》,载刘瑞琳主编:《温故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赵宝煦:《拳拳爱国心 殷殷报国情》,见赵宝煦等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升还开过一些选修课,如“国际关系”“宪法”“极权政府”“战后问题”等等。^[1]在教学之外,钱端升仍特别着力于政治制度的研究。1939年秋,钱端升组织成立了行政研究室委员会,此后在“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丛刊”的名义下,出版过陈体强所撰之《中国外交行政》、施养成完成的《中国行政制度》;钱端升也完成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后来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除此书之外,钱端升还将已发表的若干文章编辑成册,名之以《建国途径》,于1942年交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正式宣布解散。同年秋,钱端升也由昆明返回北大任教。1947年10月,美国学者费正清邀请钱端升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讲授,他欣然接受并随后在美国任教一年。在此期间,钱端升以讲课的内容编著了《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本)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可以说,钱端升的学术研究在那时已经享誉海内外。1948年4月,钱端升和董作宾、郭沫若、李济一起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是政治学组仅有的三位院士之一。

钱端升在哈佛大学教满一年之后,他谢绝了美国名校的聘任,决意回到祖国。1948年11月回到北京后,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和法学院院长。身为民国时代的著名学者,他的学识自然受到了新政权的重视。1949年到1950年代初,他先后担任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3]1950年,他还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中央委员。

在1952年夏天进行的院校调整中,钱端升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但随着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遭到取消,钱端升和他的学生们曾经长期从事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在“反右”运动中,钱端升就已经被确定为右派“标杆人物”,被归为“罗章联盟”之中,成为政法界最大的“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之后,钱端升仅仅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职位,而其他的职位都被一概撤销。^[4]此后不久,钱端升又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中,年事已高的钱端升被下放到京郊延庆县。1974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钱端升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但热情于工作的钱端升很快就陷入了失望,所里的领导层实

[1]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274~27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钱大都:《父亲钱端升的治学和为人》,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钱大都口述:《我的父亲钱端升》,载刘瑞琳主编:《温故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际上把他供奉起来，他甚至很难做任何基本的学术研究。

由于他在后半生遭遇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学术研究条件的恶化，钱端升的主要学术成果大多形成于其青年和壮年时期。作为比较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公认权威，其名山事业肇始于他在留美期间选定以议会立法委员会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正是从这篇论文开始，钱端升确立了从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汲取它国政治经验而发现政治发展规律的治学理路。回国之后，他的研究大体包括三部分：一是继续以比较政制研究为路向而将对国别范畴内的西方政制进行研究，由此得到的成果有《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组织》《法国的政府》；二是以宪法比较为焦点，而对各国宪法展开横断性的研究，力图从中总结归纳和发现政治规律，其成果专著有《比较宪法》，论文有《西班牙的新宪法》《苏联新宪法》《波兰新宪法》等；三是以中国政制之实际运作与发展为着眼点，着手对中国政府与政治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因而有专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战后世界之改造》《建国途径》，以及主持多人完成的《民国政制史》等。

相对而言，《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是钱端升研究中国政府政治的代表作。此书是钱端升1947年10月到1948年11月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以讲课内容所著的英文专著，于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又被哈佛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作为美国大学教学用书而再版，直到1980年代末仍在再版中，现已成为研究国民党政府的必读文献。著名政治学家邹悦曾回忆说，他“在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之时，始终未选修任何一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但却熟读端升师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于百忙之中，以一年时间完成的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我以为此书至今仍是权威之作。”^[1]

在此书中，钱端升将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区分开来，全书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国民党的法律结构”，“描述政府的实际运行”。^[2]此书的第一至第三章为导引部分，分别介绍了中国地理、社会、文化，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制度，这些章节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所具有的独特性，即中国在历史传统上有一套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而自成体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支撑着整个帝国的运转；第四至第七章，勾勒出在西方冲击下君主制的崩溃和议会制的失败，而在此背景下，将国民党的兴起以及蒋

[1] 邹悦：《钱端升老师对我最深远的影响》，见赵宝煦等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介石的崛起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历史叙述；第八章和第九章，描述了国民党的纲领、组织与领导，以及国民党训政的理论与实践，并认为训政是理解国民党政府形式与结构的关键；从第十章开始，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是“关于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和运作”，^[1]其中通过采用静态的结构分析与动态的历史演变及实际运行的过程考察，钱端升对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结构与职能运作都有十分精彩的描述与评价；从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五章，更多地着墨于政治生活，其中有对1946年宪法的和对1948年新政府的分析，有对政党政治历时变化的梳理，也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展望。

从总体来说，钱端升认为国民党政治虽然有训政与宪政之时间约定，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个人化的政党专制，在这种状态下的政治机构的运行实际上受制于领袖的统治。从某种程度而言，钱端升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所偏爱，认为后来的国民党实际背叛了孙中山的建国理想。他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则有所抵牾，而认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本质上是军事个人化的统治。^[2]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钱端升道出了对政府的展望。虽然他认为“猜想中国政府的未来，或者考虑什么样的改革是可取和可行的，都是极端困难的”^[3]，但他以人民为信仰，而希望能产生出一个为民 (for the people) 和民治 (by the people) 的新政府。在他看来，必须产生非军事的新的力量来推翻军事独裁统治，而这种力量必须要认同人民大众。对于中国而言，哪一种形式的民主适合于中国更为重要，中国政治演进中“形式与现实对立”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社会来推动人民实现民主来解决。^[4]

而《德国的政府》则是钱端升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书从1929年冬开始动笔，前后历时4年之久得以完成，被钱端升自认为是“所著浅薄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5]其实，这只是钱端升庞大的比较政制研究中的个案之一，其目的主要是对德国魏玛宪法及1919年后的德国政制作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德国魏玛宪法是德国走向真正的议会民主制的开始，其缜密的制度设计成为吸引

[1]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2]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28, p. 180.

[3]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87.

[4]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87-398.

[5] 钱端升：《我的自述》，见《钱端升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钱端升文集

学者关注民主政制的绝好样本。虽然在钱端升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德国经历了议会民主的失败和希特勒独裁政治的兴起，但他仍然认为“这本书仍可以助读者对于德国现代政府得一基本的认识”。^[1]

此书以魏玛宪法为研究重心，但不同于宪法研究中单调的条文解释，钱端升以历史梳理和实际运作为基础描画了整个宪法条文下的政制结构与运行过程。全书以德国宪法史的历史发展为开端，试图勾勒出魏玛宪法的源流，并标示出魏玛宪法的独特之处：既具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又有社会主义的色彩；从第二章开始，便分章介绍了权利与义务、政党、总统、政府与行政、莱希院、经济院、国会、法院、联邦制度、各邦政府、地方政府。这样叙说的目的是试图根据魏玛宪法条文对德国政府的结构与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描绘，所以在书中有大量的宪法条文的解释，如对德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即对宪法中关于人权的条文的详尽解释。但此书却又不仅止于这种条文阐释，其中还穿插了历史背景的梳理、制度优劣的比较和政治生活的实际运行等，呈现出一种立体的分析情景；如政党一章中，对1918年革命前后德国各个政党此消彼长的过程有非常精到的历史描述，对每一党派的利益构成、党纲、组织均有十分细致的分析，又对德国政党政治的特点做出“政党极端化”的判断；有关莱希政府与莱希行政一章，对政府的组成、领导者的产生与职责、办事机构与规则有贴切的描述，还对政府更迭的历史有详尽的梳理。

《德国的政府》虽然没有专门成章对德国政制的特点做出单独分析，但全书对宪法与政制的描绘中已经将德国政制的独特性勾勒出来，实际已经指出了其是具有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多成分的混合体。例如，魏玛宪法中有关人权的规定包括公民权、公益权和政治权，其中“公益权的性质往往是积极的，宪法中例举公益权，因此便带有授意国家去做此事，或做那事之意。反之，公民权的性质可以说是消极的，人民的自由，即等于国家之不自由”；^[2]而德国总统制所要求的是“如何而总统可以有力抵制国会的跋扈而同时又不致破坏议会之精神；换言之，如何而可以兼有法美之长而无其弊”。^[3]如何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同时又让民治精神得以体现，这成为贯穿全书分析德国政府的线索之一。

虽然此书因力求全面描述而使其解释分析的深度有所限制，但仍然是民国政治学

[1]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25～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不可多得的研究比较政制的学术论著，其详尽的文献搜集与梳理更拓展了此书的学术厚度。陈之迈曾专门对此评价说：“《德国的政府》为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贡献”，“此书的取材异常丰富，观乎书后所附十七页的参考书目便知作者学问的渊深，除法律命令等材料外，德法英文中的重要典籍几浏览无遗，实为我国著作界中所罕见。”^[1]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德国的政府》都可称得上比较政治制度中的经典文献。

此外，1943年，钱端升还出版了《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法院的建立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针对相关问题的唯一有分量的专著，^[2]而且连同前述有关国际形势的研究论文和评论，共同造就了钱端升作为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专家的显赫声望。

尽管钱端升自“反右”运动以后已无法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但仍主持编纂了《西方法政研究资料》。幸运的是，钱端升还是看到了政治学的复兴。在“拨乱反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即1979年1月26日，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钱端升得以平反，而此时他已79岁高龄。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钱端升被推选为名誉会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似乎是为了弥补“反右”之后二十多年里不能触及政治学研究的遗憾，他勤奋工作，从自己以前的著作中择萃精华，编撰成册，名之为《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了人大立法工作，在新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位上，参加或主持修订了许多重要法律。

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在北京逝世。2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1957年，钱端升受到不公正待遇，‘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冲击。尽管如此，他并未动摇对党的信念，并在81岁高龄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钱端升去世10年之后的2000年2月，中国政法大学主办了“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百年学术会议”，与会者提交论文，进行讨论，对钱端升的思想轨迹和知识贡献做出了公允的评价。

[1] 陈之迈：《钱端升，法国的政府；邱昌渭，议会制度》，载《社会科学》，1936年第1卷第4期。

[2] 端木正：《重温钱端升教授关于国际法院的设想》，见《端木正自选集》，423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目 录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

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 / 3

政治学 / 13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 18

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 / 30

英国之员吏制度 / 54

西班牙的新宪法 / 61

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 / 81

希忒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 / 101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 122

论极权主义 / 132

波兰新宪法 / 135

苏联新宪法 / 144

浅说民权与极权 / 163

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 / 167

第二编 国际政治

世界公法学会 / 171

国联与和平机构 / 174

论国联政策为唯一正大而有利的政策 / 183

国联政策的实施及运用 / 189

新世序与世界公务员 / 195

论战后国之大小 / 199

第三编 中国政府与政治

评立宪运动及宪草修正案 / 203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 214

孙中山先生的宪法观念 / 221

论官等官俸 / 229

新中国与一党制 / 239

现代化 / 243

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 250

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256

NEW CHINA'S DEMANDS/ 279

WARTIME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289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INESE GOVERNMENT / 310

THE OUTLOOK FOR A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323

附录 清华改办大学之商榷 / 337

编后小记 / 346

- 新近宪法中立法行政两机关之关系
- 政治学
-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 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
- 英国之员吏制度
- 西班牙的新宪法
- 德意志的国会及国会议员
- 希特勒秉政前的德意志政党
-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 论极权主义
- 波兰新宪法
- 苏联新宪法
- 浅说民权与极权
- 罗斯福四大自由之知与行

第一编 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